

陈经华 著

新加坡的 惠安人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新加坡的 惠安人

陈经华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新加坡的惠安人

陈经华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惠安县印刷厂排版

惠安县印刷厂印刷

(惠安县螺城建设路 106 号 邮编:362100)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3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2000

ISBN7-80640-038-9

I·932 定价 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一

黄金陵

新加坡是我童年起就魂牵梦萦的地方。因为我家前两代多位亲人曾远涉重洋去那里谋生。我从他们的通信以及回乡后的言谈中多少了解一些那边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多年来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踏足那“远在天边”的宝岛。然而这一愿望却一直到现在才得以实现。

那是1992年岁末，新加坡国立大学来函邀请我到该校化学系访问。其时，我刚卸任福州大学校长职务不久，处于“无官一身轻”的状态，便毅然接受邀请。在星洲逗留十多天，除了与同行们开展学术交流之外，趁机探亲访友，探寻先人的遗踪。正由于亲人们曾在这片热土上苦苦耕耘过，我特别喜欢聆听老一辈惠安人述说早年在崎岖的道路上顽强地跋涉的情景。交谈中我发觉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的奋斗史。尽管所走过的道路千差万别，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祖祖辈辈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奋斗中锻炼出来的刻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惠安精神”，带到异国他乡，发扬光大。听着这些先驱者们回忆不寻常的往事，我常常心潮汹涌、思绪万千，萌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些奋斗者的足迹记录下来，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了先辈，也为了后人；为了昨天，也为了今天和明天；为了海内，也为了海

外；为了理解，也为了情谊。然而，苦于时间短促，公务繁忙，回国后，只把访问新加坡之所感，摘取几朵浪花，写成一篇短文，题为《“老巴刹”咖啡摊上乡情浓》，见诸报端，其他的便无暇顾及了。不过这件事却始终在心中惦念着。

1995年10月，新加坡举行怡和轩俱乐部成立百年庆典。怡和轩俱乐部是闻名海内外的圣地，早年孙中山先生曾经在其中活动过，抗日战争期间它成了陈嘉庚先生团结侨人，支持祖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大本营。我作为集美大学校长应邀参加纪念活动，再次赴新。是时，正值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陈经华副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陈老师是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也是惠安老乡。他写过不少关于陈嘉庚先生及其他知名华侨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我提议由他利用业余时间采集和撰写旅新惠安华侨事迹，陈老师欣然同意。

为此，我介绍陈老师与新加坡惠安公会的负责人见面，提出我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惠安公会原先也正在考虑收集、整理惠籍华侨、华人的事迹，用以教育下一代，继承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并且也已初步做了一些工作。这样，事情很快就谈定。此后，就由陈经华老师和他们合作，着手进行。

六个月后，陈经华老师完成学术访问的任务归来，带回他采写的稿子，定名《新加坡的惠安人》。我看了全部初稿，觉得内容比较充实，真切感人。虽然只选写了二三十位人物，还不能说选材全面，但基本上能反映出百年来惠安人在新加坡奋斗、生活的概况。文中人物涉及各时期、各业界，可以说各具特点。文章的可读性较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同惠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江炳其谈起这本书，他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认为这样的书有价值，并表示支

持出版。不少海内外乡亲对此也表示关注。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增进理解和交流，需要架设各种桥梁。能为架设此类桥梁起一点作用，哪怕当混凝土中的一块石子，绑扎钢筋的一段铁丝，都是很有意义的。我期望这本书能为架设这样的桥梁，充当石子和铁丝的作用。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于集美大学

序 二

《新加坡的惠安人》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我县已经编了《惠安县华侨志》、《海外惠安人名录》，有了较完整的华侨史志。《新加坡的惠安人》，以对杰出人物的真实记述，使我们更直接、更深刻地了解新加坡的惠安乡亲百年奋斗的艰辛和取得的成就，了解他们对桑梓的一片深情和无私的奉献。

本书辑录的主要是新加坡杰出惠安人的事迹。他们是惠安人的骄傲，理所当然地应该大书特书，树碑立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新加坡惠安人的代表。宣扬他们的事迹就是弘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惠安精神。

本书是海内外惠安乡亲合作的成果，体现着海内外乡亲的共同情怀和愿望：弘扬中华文化，发扬惠安传统，联络乡情，加强合作，促进故乡和海外居住地事业的共同发展。

采写《新加坡的惠安人》的设想是黄金陵教授提出来的。黄教授任大学校长多年，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的构想，既有远见卓识，又有独创性。陈经华副教授在国外进行学术活动之余写成此书，付出很大的努力。他们身在县邑外，心在桑梓里；利用自身条件之便，为故乡着想，为乡亲做事。

惠安有120万人口，还有近70万乡亲居于海外，出了许多人才。他们的事迹值得整理记录。这是一件对得起先人，益于当世，

造福后辈的大好事。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好记述海内外杰出惠安人的著作问世。我们也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本书的出版得到惠安县财政局、土地局、建设局、交通局、侨办、侨联的支持和赞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惠安县人大常委会华侨工作委员会

1997年7月30日

目 录

序一	黄金陵 (1)
序二	惠安县人大常委会华侨工作委员会 (4)
新加坡的惠安人	(1)
郑聘廷 星洲华人百年史中的重要人物	(16)
许济侯 惠邑同侨之先辈	(21)
黄永祺 善行硕德 人世楷模	(24)
谢荣西 石王爱才更造士 铁性成事亦招损	(31)
高参法师 南洋少林四十九传	(36)
刘玉水 陈嘉庚的好学生	(42)
庄奎章 一生沉浮皆为文	(51)
胡少炎 古道热肠 身体力行的慈善家	(55)
庄竹林 华人教育一代宗师	(59)
江蕴玉 慧眼独具识真金	(68)
曾心影 办报有方	(71)
张建金 行侠仗义的豪杰之士	(75)
庄右铭 一家俊秀 儒林佳话	(81)
庄重文 工商巨子 学界一杰	(88)
邱新民 东南亚杰出的通儒	(93)
邓炳明 中西结合 仁爱济世	(101)
曾纪华 惠人惠己 安国安家	(108)

王水九	桑梓情深代代传.....	(114)
骆水兴	为人处事的大学问家.....	(119)
刘魁发	艰苦缔造家业 热心服务社团.....	(128)
黄桂楠	柔佛苏丹赐封的特级拿督.....	(131)
庄绍华	新加坡著名生物学家.....	(134)
谢嘉惠	星洲第一位惠籍高级政务部长.....	(136)
柳侣春	一个贡献重大的普通商人	(140)
庄日昆	亲民爱民的高级政务部长.....	(143)
郭明星	应责任召唤的接班人.....	(148)
公会众后生		(155)
星洲日记摘抄		(162)
后记		(192)

新加坡的惠安人

—

惠安人南渡新加坡的确切年代，未可考。

据英国人芬理逊记述：新加坡开埠后第三年，即 1821 年 1 月 18 日，第一艘中国帆船自厦门直接航抵新加坡。这是一艘泉州远洋航行的木帆船，俗称“乌槽”。此后，泉州府就有人到新加坡。惠安和泉州相连，属泉州府，所以，在这早期来星的泉州人中，有惠安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据另一记载，惠安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即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来新加坡；19 世纪末，来坡的人才逐渐多起来。1855 年前后，惠安人王狮伯的父亲到新加坡。这是迄今所知的最早来坡的惠安人。王狮伯之父和马来人共居，通婚，接受马来文化、习俗，一代复一代。

19 世纪 90 年代，惠安人陆续南来。当时英国已占领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英殖民者在马来亚大规模发展种植业，开采锡矿。因受当时马来亚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经济方式所制约，英国人无法从当地找到所需的劳工，于是就转向外域，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寻觅劳动力。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其劳工到马来亚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长期实行海禁。雍正五年（1727 年）海禁开放，但对出洋仍加种种限制，华人来星马实属不易。为了便于得到足够的华工，1860 年，英政府强迫满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上明文规定准许华民赴英属地或海外其他地方工作。自此，华工便

成批地涌出国门。

最早的华工大都是被作为“猪仔”从中国贩卖到南洋的。广州、厦门都设有专事华工贩卖活动的“猪仔馆”。惠安人在厦门打工的很多，一个时期竟占全厦门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推测，在南洋的“猪仔”中，一定有不少惠安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作为自由移民南洋的华人逐渐增多。惠安人也随之大批移入新加坡，此后出现三次移民潮。

第一次是 20 年代。那时，南洋经济已相当发达，许多到南洋，包括新加坡，经商的人都发了财。一些有识之士就卖舟南渡，到新加坡等地寻找发达的机会。另外，当时闽南一带土匪横行，匪患成灾，民不聊生，许多人为了活命，谋求生计，南逃新加坡。在 20 年代南渡去新加坡的人中，逃难的人居多数。

第二次移民潮出现在 30 年代中后期。1935 年，中国政府实行“保甲制度”，实行“抽壮丁”的兵役政策。由于政府腐败，“抽壮丁”变成“抓壮丁。”被抓去当兵的人受到非人的待遇；一旦被抓去当兵，就如同判了死刑，难望生还。为“跑壮丁”，许多人南逃。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生灵涂炭，许多店号、文化机关团体关门或内迁。时势所迫，许多人离井背乡南去。这个时期的移民人数激增，其中有相当一些是文化人。

第三次移民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此时殖民地政府准许移民南来。1949 年 10 月之后，殖民政府限制移民入口，南来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家属。

三次移民潮都是国内外的大趋势决定的。从福建、广东的其他县邑到南洋其他埠头的移民情况也大致如此。

惠安是一个穷县。惠安人历来靠手艺外出谋生。惠安的石匠、木匠、泥水匠、“打银匠”，身怀传统技艺，远近闻名。南来新加坡的惠安移民，凭着一技之长和传统手艺在新加坡找到用武之地。

以乡亲的技艺为基础，出现了一些在这些行业很有作为的惠安人，如被称为“建筑王”的苏妈英、“石王”谢荣西、“金王”许洁成、许生理兄弟和“盐王”郑天元。

惠安靠海。靠海吃海，南来新加坡的惠安人在海上、码头讨生活摇大舢、挡艚舢的不少。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驳运业、航运业、船舶供应商等。

拉人力车、踏三轮车也是惠安人在新加坡所从事的一个重要行业。这种工作比较苦，但不需要太多训练，许多没有一技之长的惠安客都选择这职业。迄今，在新加坡尚存的三轮“车夫”中，惠安人仍占绝大多数。

一些读书人，知书识理、能写会算，运气好的可以在店口或廊头讨个“头路”，当“财副”。个别有学识的，可在学校讨个教职或其他工作。

靠“父母力”打工的人叫“估俚”（苦力），打工叫“弄帮”。早期来新加坡等地的“估俚”，生活很苦。初来的“唐山客”，如果幸运，有某一商店或廊头收容，得以学工。学工没有工钱，“头家”只供食宿。几个月后，如头家满意，可留下当“估俚工”，每月二三元工钱，由“头家”直接寄往“唐山”家中。没有店口或廊头可以“弄帮”的，只得住“估俚间”，做散工、粗工，叫“粗估俚”。

“估俚间”就是单身劳工的集体宿舍。数十人共租一楼，每人一个铺位，一个放衣物的木箱，一条红毡。一般没有床，只有统铺。有工做的，每人每月交一元或五角；无工做的可免。

惠安来的石工、土工、木工及摇大舢、挡艚舢、拉人力车的都是“粗估俚”，都住“估俚间”。当上店员的则住店头。无人可依、无处可靠的睡猪砧、廊道。

他们干十分艰苦的活计，生活又十分俭省。惠安人出门就是

为“挣钱”。“南洋钱唐山福”，即使是当了“头家”的，也省吃俭用，吃的也是地瓜稀饭就咸菜，偶尔加点肉。无论贫富，都想省钱回“唐山”。

惠安人南来，多半是靠同乡或亲戚介绍、接济，所谓“亲眷亲”。因此，带有鲜明的地域性。来南洋之后，他们又都聚居在某几个点，从事类似的行业，惠安的新加坡侨民多数集中在大坡区，如切加东、牙笼一带。新同乡来了，往往被安置在“估俚间”内，衣、食、住均由乡亲负责。找工作、办手续等也离不开乡亲。尽管南来之后，龙腾虎跃，各显其能，有的升腾，有的沉沦，但不管各人的事业、地位、彼此间的利害关系有多大变化，“乡亲”这个用血缘和地域关系联结起来的链条，始终维系着每一个南来的惠安同乡。

三四十年代以前南来的惠安客，多数是抱“挣一些钱就走”的想法，逃难而来的则等“太平”就回。他们称新加坡等南洋埠头为“侨居地”、“客地”、“异国他乡”。来洋之前，许多人已在故乡婚配，有了家室。他们的妻子跟丈夫到南洋的不多，多在家苦等着丈夫回去。“路边野花君莫摘，要爱家中一枝花”，反映的就是“番客嫂”、“番客婶”的心态。有些人少小离家来洋，孤身只影，待到成年之后，还是回去娶亲。年纪大的，都盼回归故里，“叶落归根”。

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经济不发达，百姓贫穷，惠安尤甚，多数人回去就没出路，因此有家不能回。有钱的怕土匪抢劫，怕地头蛇敲榨，也把回乡视为畏途。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一二十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惠侨回乡成为不可能。因回乡难，许多人在洋成了亲或娶侧室。许多在家娶的妻室也都先后带子女南渡会亲。于是，多数惠安侨民就这样在新加坡定居下来。但他们仍是中国人，他们的祖国是中国。

新加坡的惠安人到底有多少？据测算：20年代已有人，50年代3至4万，现有人数超近13万。实际数字不会低于这个估计。

二

本世纪二十年代、槟城、新加坡聚居了相当数量的惠安人，形成了惠安人的群体。

南渡的广东人，福建人来到异国的土地，为了生存，为了发展，都以同胞、同乡、同族、同业等关系相互认“同”，凝聚在一起，结成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宗旨的群体。

当时的殖民政府对南来的中国人实行不管政策。侨民只要不犯上作乱，不违其法，政府什么都不过问。中国方面，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没有一个政府想管，也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管这些远离祖国的中国人。海外的华侨是一些谁也不管的人，是一群得不到任何保护的人，因此被称为“海外孤儿”。

“没人管”似乎是件好事。但作为一个群体，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来统一成员的意志，规范成员的行为，调整彼此间关系，是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的。于是在南来的中国人中，出现了许多以认同为基础的组织，主要是同乡会性质的“会馆”“公会”。广东人在这方面先走了一步。

1914年，槟城惠安公会成立；1923年，仰光也成立了惠安公会。

旅居新加坡的惠安同乡，也深感有成立公会的必要。首先，在商业竞争和政治角逐中，同乡要组织起来，互相照应，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协调和其他帮的关系。

其次是，来新的同乡日渐增多，需要有一个组织接待、安置。另外，同乡的福利、社团活动，无统一的组织难于进行。南来的

惠安人内部的关系也亟需调整。那时，各乡、各姓都有自己的“估俚间”。“估俚间”与“估俚间”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而在同乡间时时有冲突发生，甚至大动干戈。乡亲们离乡背井、跨洋过海来到南洋，谁也不愿自己或看到别人死于无谓的械斗之中，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共同的组织来管管这些事。

第三，当时各地的中国侨民，仍是中国籍人，他们的祖国就是中国。他们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华侨要参加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其中起作用是很难的。

于是，先贤何衍品、庄济清、张文丕等便着手进行公会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3年5月5日，惠侨夜学校开学。出席典礼的有惠侨中的知名人物郭枚生、许济侯、谢荔圃、黄永祺等。惠安同乡济济一堂。这是星洲惠安人第一次盛大集会。同时成立的有夜学的赞助人机构。这一机构为夜学提供经费，更重要的是以该机构为核心，开始倡组惠安公会。

同年7月13日，假郭枚生的益隆棧二楼召开第一次旅新惠侨联合会筹备会。出席者28人，21人为发起人，其中有谢荣西、苏妈英、郭枚生、许洁成、谢荔圃等人。

8月28日，第二次筹备会开会。会议决定成立惠侨联合组织，并正式定名为“星洲惠安公会”。会议决定委托许济侯草拟公会章程。公会的宗旨是：联络惠安侨胞以举行公益进步文明。第一批招收会员107名。

10月2日，惠安公会举行第一次选举会，选出第一届执委会：会长苏妈英、副会长谢荣西、司理郭枚生、财政许洁成、文牍连爱同、庶务黄永祺、何衍品，执委会下设交际部、教育部、慈善部。慈善部设评议员多人。

公会成立后，便正式向殖民政府的华民政务司署注册；扩招会员。周年庆原定每年的双十节，后改为4月27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义之日。由此可见公会发起人高度的爱国革命热情。在周年纪念会上，黄永祺和连爱同合撰楹联一对，曰：

黄花岗上追遗迹

洛阳桥界奋精神

星洲惠安公会的成立，是新加坡惠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新加坡惠安同乡团结、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三

惠安人耿直。耿耿忠心，对人、对家、对国，一片真诚；直率从事，是苦、是险、是灾，从来不避。

新加坡惠侨继承惠安人的传统，爱国爱乡，不落人后。

早在辛亥革命前，新加坡的惠安先贤们就积极投身革命。惠安籍的郑聘廷牧师，率先组织星洲书报社，为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提供宣传革命的场所，吸引了许多华侨参加反清的革命。郑聘廷自己也参加了同盟会，并且介绍了教会中许多有名望的人加入同盟会。他和孙中山后来成为至交。孙中山在新加坡时，为安全起见，晚上就住他家。鉴于郑聘廷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给郑聘廷组织的星洲书报社颁发“旌义状”，嘉奖其在“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的功绩。郑聘廷被认为是星洲华人百年史中一个重要人物。

在惠侨中，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剪掉辫子和满清决裂的还有黄永祺、许济侯等人。许济侯因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遭清政府通缉。他们在同侨之中开了革命之先河，起了带头垂范